

## 《“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

China's Path to “Participatory Socialism”?

黄宗智

Philip C. C. Huang

摘要：回顾中国的现当代史，“集中”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的人民参与无疑是一双互动合一的整体。其历史尤其可见于中国革命史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和之后的内战，也可以见于其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更可以见于初级合作社时期。之后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则分别展示了需要警惕的单一面化的集中和放任极端。改革时期则可以看到民众参与的大规模提高和扩展。往前展望，集中与民众参与二者的平衡结合乃是中国式“参与式民主”的关键，与西方的选举式、三权分立式和特别突出私人自由的民主十分不同。鉴别两者，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现代传统的实际，并看到西方众多人士所用于中国的“极权主义”模式的偏误，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西方式“民主”与其“极权主义”模式；中国革命、抗战和内战中的民众参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偏颇；改革时期的扩大化民众参与；皮凯蒂与中国式的民众参与式社会主义

### 一、问题与定义

人们对于“民主主义”的理解多限于西方式，尤其是英美式的“选举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 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度，并特别突出私人自由，强烈倾向将其他的可能民主形式排除于“民主”范畴之外。本文论证，我们需要澄清另一种模式的民主，可以称作中国革命的“民众参与式民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但绝对没有达到西方那样程度的独立化的分权，也没有同等的民众选举制度。共产党的最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说是凌驾于那些三分机构之上的一个总揽大权实体。它是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的一面，乃是凌驾于西方式分立的三权之上的最高集中机构。正是这个集中的一面，在西方许多

观察者看来，乃是一个纯粹“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全能主义”“totalism”、乃至“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体系，完全不可与西式民主相提并论。

将中国魔鬼化的“极权主义”模式和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 1980 年代以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的趋势下——根据皮凯蒂的权威性研究，如今，其社会 50%的下层，只占有全国财富的 3%，而其最富裕的 1%，则占有全国财富的 40%（Piketty 2020；亦见 Piketty 2014）——最近十多年影响越来越大。正如皮凯蒂所论析，尤其是那些失去了中产阶级生活水平の中下层人员，较广泛认同于新興的极右民粹主义——认为自身的贫穷是由于大量的有色人种渗透美国社会而攫取了自己的工作，也是由于美国企业大规模将许多原来属于自己的工作“外包”给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劳工。

（Piketty 2020）这是美国日益强烈反有色人种和反华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兴起的根本原因，简单将其认作自身经济困境的肇因。（我们需要将此股新潮流区别于五十年代初期之后兴起的右派极端反共意识形态浪潮。）

本文论证，要真正认识中国的政经体系，我们须看到其威权主义传统之外的另一现代历史传统，即“民众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的维度和愿想，不可以仅凭“威权主义”，“全能主义”或“极权主义”等单一面化的范畴来认识和理解。正是人民共和国的民众参与传统，才能协助我们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统治实质的另一面，并由此看到另一种“民主”的可能。

“参与式民主”传统<sup>1</sup>和共产党领导的“威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传统，一如官方的词语“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 所表明，应该被视作一个二元并存互动 dyadic 的传统，区别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either/or dualism。有的人会将“民主集中”认识为一个先民主（如民主讨论），后集中（决策后无条件地服从）的（对立）二元，但我这里则将这两者视为一个“中国

---

<sup>1</sup> “参与式民主”当然与“人民”理念紧密相关。徐俊忠 2022 是对后者的含义与演变比较系统的梳理。

思维”型的并存互动合一体，讲究的是两者平衡，而不是一先二后（黄宗智 2022b）。我们可以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其掌权之后的历史和其改革时期的历史中看到那样的双维的并存、互动、张力和合一，当然也可以看到其失衡的现象。无顾那样的双维互动传统便不可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实质和真髓，更不可能看到其前瞻性的未来可能。

## 二、中国革命史中的参与式民主传统

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参与式民主最突出的实例之一乃是抗战历史时期中民众参与革命的实际。在被国民党军队围剿的客观情况下，在被迫撤离其中央苏区而进入“长征”的转移和革命的低谷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中，面对敌我双方火力相去较远的国民党和日本军队，居然在边远地区建立了总共 19 个成规模的解放区，到抗战结束时，已经涵盖共约 1.2 亿的人口，即当时不止五分之一的人口。（《19 个大的解放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来》）那显然是不可能仅凭由上而下的“控制”而得出的成绩。抗战后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已经确立了其之后在内战时期足可与美式装备的国民军队抗衡并获得最终胜利的基础。其中的关键新因素正在其最困难的时期成功地大规模动员和获得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内战时期，至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是民众积极参与的“人民战争”：高效动员民众参军、高昂的士气、能够在敌后用游击战打击对方、从民众获得精准情报、有效动员敌人所做不到的后勤等。

内战之后，再次凭借与此传统直接相关的解放军独特的士气和组织能力，以及国内大后方的民众积极支持，在朝鲜（“抗美援朝”）战争中与当时全球最先进、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打成拉锯的平手。在双方技术、火力、装备等方面强弱悬殊的实际情况下，在对方占有机动、制空、制海等的压倒性优势之下，参入后居然从鸭绿江反攻到三七线，并在三八线形成拉锯的局面，由此获得板门店谈判的结果，以三八线为界来划分朝鲜与（南）韩国对峙的结果。如果“解放军”没有其从

抗战和内战时期所建立的士气、民众参与和特殊组织韧性，那样的结局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那是当时使全世界都感到十分惊讶的结果。它不可能是仅凭由上而下的极权控制所能做到的。（黄宗智，2022a）

美国流行的右派论析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简单划归“极权主义”范畴，将其视作几乎是与基督教中与上帝对立的魔鬼似的建构，显然是经不起认真考验的误识。我们须要直面历史实际，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集中”一面之外的“人民战争”中的民众积极参与传统的另一面。看到两者合一，才有可能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在抗战、内战和朝鲜战争中所遗留下来的传统。

### 三、当代历史中的偏误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共产党的民主集中特殊性质，在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下，曾经出现过严重的倾向过分管控的偏颇，也出现过失控的动乱偏颇。前者可以在大跃进时期的天灾人祸中清楚看到；后者则可以在陷入动乱与暴动的文化大革命偏颇中清楚看到。我们不可忽视那样的偏颇而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社会过分简单地浪漫化。

回顾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各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在初级合作社时期，党建与民众参与两者的成功结合。一方面，“党建”固然是个建立渗透全社会的、号令一致的党组织；另一方面，也是个建立于民众积极参与，先是土地改革而后是初级合作社的建立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号令一致的组织，也是一个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众积极参与的组织，更是一个借助民众参与的党建过程。（这方面的论析，尤见高原，2018）

虽然如此，我们也要直面以下的实际：即其后的过度威权化和极端化的“大跃进”，由于中央采用了不符实际的“越大越好”基本战略，包括计划经济的确立和贯彻，陷入了以管控为主导的治

理和思维陷阱，将不符合实际的虚构强加于人民，犯了试图凭借组织意志来推动“大跃进”超前发展臆想的错误。其结果是人祸与天灾，使中国的经济和治理都陷入了灾难性的危机之中。

再其后，在农村组织的层面上，基本返回到初级社的民众参与式民主，将最基本的组织和所有单位再次设定为基于自然村（区别于行政村的）“小组”，终结了超大的人民公社及其不符合实际的排除分户生产和建立大食堂等极端的过度组织化、命令化的偏颇。

虽然，仍然保留了统一领导和“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组织，一定程度上壮大了严密管控人民（社会）与经济的体系。那是一个偏重由上而下的计划远过于由下而上积极参与的体系。官僚主义管控因此成为整个政治体系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正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带有严重的脱离实际的倾向，重形式而不重实质，带有强烈的“推卸责任”、“层层加码”、“彰显权威”、“化简为繁”、“设置不必要的关卡”、“媚上欺下”等诸多恶劣的倾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20.12.18）大跃进乃是当代历史中的一个鲜明的实例。那样的官僚主义问题特别需要民众积极参与的“民主”来遏制、纠正、平衡。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能够看到，其后，由于官僚主义化的过分管控，促使毛泽东号召过分激烈的反应，作出“文化大革命”的决策，试图通过动员民众的积极性来克服官僚脱离实际和过分管控的弊端。但结果是，文革很快走到了极端，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偏颇和混乱，造成众多严重的失误，包括一段时期中较广泛暴力化的行为，对被认作“阶级敌人”者进行过激打击，促使对许多无辜人士的粗暴行为甚至残酷虐待。从本文的角度来观察，文化大革命犯的乃是与大跃进相似但反面的错误，其不同在从大跃进的过分由上而下官僚主义指令和管控极端，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的过分无政府型动乱的极端。

这里，我们需要将文章前面叙述的积极参与区别于另一种不同的民众参与，即共产党+政府体系历来不少使用的，动员民众来协助“整党”、“清党”的方法和传统，其目的包括借助群众参与来揪出党和官僚体系内部的腐败分子，或借之来对党和机关进行整风。本文强调的不是那样由上而下的“群众路线”，而是民众自愿和积极的参与，并提倡将民众积极参与和支持设定为关乎全民的战略性决策的不可或缺条件。也就是说，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与平衡互动，来防御高度集中的共产党+政府体系中可能出现的、像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偏颇和失误。

对中国农村来说，今天仍然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在 2006 年终止了从农村提取税费之后，转向国家财政拨款来协助乡村的现代化，虽然是良好的转变，但是，伴随国家的拨款而来的是相当强烈的乡村治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化弊端，亟需纠正（例见桂华 2022 的论析）。过度集权下的官僚主义弊端不是通过科层制化所能解决的。取鉴于历史，最好的办法不是进一步的形式化、程序化、或数据化，而是名副其实的民众自愿的积极参与和支持。集中与民主参与互动结合与平衡才是防御集权所可能导致的失误的最佳方案。

#### 四、改革中的民众参与

文革的偏颇最终导致改革时期及其新型的重新建立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一定程度上乃是去官僚主义化统治的民众参与式改革的变化。

##### （一）民众的新型“权利”

首先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民参与式自主。承包制的广泛推行意味许多农民在经过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统治之后，首次获得了之前二十年之中没有的各种各样自主权利，尤其是生产和销售抉择方面的自主。之后，更逐步纳入进入城市打工与否的自主。

结果是农业经济的大规模市场化和农民就业的大规模自由化。固然，承包制也有诸多方面的限制，譬如，粮农仍然受到诸多命令型的约束，须要在国家保护“粮食安全”的大战略下进行生产，其自由抉择有一定限制。虽然如此，仍然有众多的农民首次获得了可以自主种植生产什么和卖出什么的权利。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结果是推动了我称作高附加值的“新农业革命”，如1、3、5亩地的拱棚蔬菜和数亩地的种养结合等型式的新型小农农场。如今，如此的新农业从业者已经达到共约1亿人的总数，即务农人员总数中的三分之一，所生产的则是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黄宗智，2016；2020a）

此外则是巨大的农民工浪潮，如今已经达到将近三亿人之数。首先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选择在居住地从事非农就业，共1.2亿人员。（《202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外出农民工规模及农民工平均年龄分析[图]》，2022；亦见黄宗智，2020b）。

再则是“离土亦离乡”的外出打工农民工，共约1.7亿。（同上）固然，他们仍然仅有一种二等身份，没有正规工人的工作保障和医疗和社会保障权利，其子女没有就父母工作所在地地上学的权利，仅是一种“非正规”的就业。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从1958年确立城乡户籍身份壁垒之后，农民首次获得可以自由进城打工的“权利”（当然，其树立是经过一定过程的，从被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乃至初期中仅得半正式的认可，而后逐步达到如今自由选择阶段）。总体来说，农村的改革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名副其实的赋权、赋能性的民众积极参与式改革。虽然，去真正消除“三大差别”还有一定的距离。

同时，是具有几乎同等重要性和规模的、伴随城市企业的兴起和教育体系的大规模扩大而来的新型的、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国际大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如今已经达到3亿人之数。在众多不同的估计和相关研究中，比较严谨的一项研究是使用欧盟的中产阶级的标准——即2013年每日人均收入达到36美元（经过当时的“购买力平价”PPP换算为135元人民币）以上，120美元（换算为451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以下，将户主以此数的100%估算，户主之外的成年人以50%估算，

14 岁以下儿童以 40%估算。其研究方法和数据使用来自 1988 年开启的中外研究人员合作的“中国按户收入(抽样)调查”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历经 1995、2002、2007、2013 年的后续合作研究。据此，得出 2013 年中国中产阶级总数乃 2.54 亿人，即总人口的 19%。

（相比 2002 年的才 0.125 亿人，即总人口的仅仅 2.4%。）（Gustaffson, Yang, and Sicular 2020: 106-110）

其后，同一组研究者根据相似的方法，将估算延伸到 2018 年，是年划分下线为 154.9 元人民币（37.5 美元），上线为 516.4 元人民币（125 美元），得出中国中产阶级总人数乃 3.44 亿之数，即全人口的 25%。<sup>2</sup>（Sicular, Yang, and Gustaffson, 2022）

这是一个与国际/全球的现代化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具有一定程度共同性的人群。在生活方式上，他们有房有车，收入和消费达到欧盟的中产阶级水平，可以与全球的中产阶级相提并论。无论在生活习惯还是人生观、价值观上，他们都与全球的中产阶级有一定的共同。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将这个观点绝对化。譬如，在人际关系、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上，都仍然保留着许多深层的不同。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是相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化。

## （二）官僚上下层以及官僚与人民间的关系

与上述的演变一起来的是，将根据地时期的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为较普遍地实施一种上下级“发包与承包”机制的做法。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周黎安教授称作行政体系中的）“内包”关系，允许地方上，在中央设定的发展指标下，较大的自主权，并凭借“官场”的竞争来激发地方官员们的积极性，促使他们为了自己的仕途而向属地企业伸出“帮助之手”来获得其自身晋升的政绩。同时，又凭借市场的运作规律来限制和淘汰没有竞争力的工程，包括地方政府时而策划的“形象工程”。（周黎安，2021）其中，一个关键的措施在，将巨大的土地乃国家所有制

---

<sup>2</sup> 这也是同一组作者们前一篇文章对 2018 年的过高估测（4.54 亿，总人口的 33%）的修正。



度下的土地财政权力和其所附带的巨大资本，逐步发包给地方政府，给予其财源并激发其对属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从而成功地推动了划时代的地方经济发展(黄宗智 2021b)。

同时，更在依赖行政“外包”的制度下，由官方提供“项目”资源来激发各种各样的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发了大量的由下而上的为争得“国家”提供的财政资助而被激发的能动性，竞争性，乃至创新性。(同上)

以上几项主要的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力，成功地推进了中国划时代的经济发展，促使中国行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sup>3</sup>虽然，在人均收入的层面上，仍然处于全球的中等水平，未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 五、中国式的未来愿景：“参与式社会主义”

在以上的当代中国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西方式的选举型民主，和完全的三权分立型民主，或西方那样高度的私人自由权利，但能够极其鲜明地看到一种新型的民众参与。这是一个没有西方式民主特色的演变，但是，它绝对不可因此而简单地划归被西方反共及右派民粹意见所丑恶化为单一面的“极权”压迫性制度。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改革首先是赋予广大农村人民，相比计划经济时期下的二十年，前所未见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导致了如今许多小农户得能自主决定生产什么和经过市场经济销售什么来营利的权利。伴之而来的是高附加值“新农业革命”的兴起。这是伴随中国人民食物转型——从旧式的 8: 1: 1 粮食、蔬菜、肉食结构转化为 4: 3: 3 的比例——而来的变化，是从事“劳动与资本双密集”新农业的小农户，在市场参与度和农业收入层面上要显著地高于过去的旧式粮农或一般旧式农民。(黄宗智 2020; 亦见黄宗智 2010)

---

<sup>3</sup> 若以“购买力平价”(PPP)来估算，则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其二，则是 3 亿“农民工”阶层的兴起。虽然，他们仍然在户籍身份、福利、收入层面上是一种次等的“非正规”人员，但没有疑问的是，相比计划经济时期，享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主能动性，参与了改革后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大演变。未来的方向应该会是逐步迈向消除城乡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差别。

其三，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最近二十年中，改革还导致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包括（中小型私营企业主及其白领职员，也包括众多新型专业人士。在行为方式和追求上，乃至价值观等层面上是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比较相似的。虽然，也仍然在有诸多源自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不同。

最后是 2015 年启动的“脱贫攻坚”工程，大规模动员基层干部和党员深入农村，协助底层贫民脱贫，到 2021 年（2 月 25 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战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成功结束，总共协助将近一亿（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脱贫攻坚战”2022）这无疑乃是获得相关民众支持的一项工程。

往前展望，由于最近二十年来的变化，也由于共产党一再申明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及党章和宪法一再重复申明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主导性目标，更由于近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充——如今已经超过总人口中高等教育年龄的青年总数的不止一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中国颇有可能迟早将会达到比西方高的分配和社会公平。

这一切不是要无视目前实际上仍然存在的巨大上下阶层差别和巨大的管控型官僚体系，而是要根据最近几十年的改革动向而设想一种中国式的前瞻愿景。它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型、三权分立型民主以及高度个人自由化型民主，而将更多呈现为一种中国式的、可以称作“参与式社会主义”的

民主。它将会较少采用选举制度，带有较低度的政府、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以及相对较低度的私人自由，但它也很可能将会具有比如今更高度的民众参与和社会公平。

那样的话，中国共产党将更加不会是一个极端的“集中”组织，而是一个越来越与民众参与式民主结合、平衡的治理、领导组织。在共产党的民主集中二元性实质之中，其命令型统治的一面将有可能越来越倾向更符合民望的民众参与式统治，真正起到更高度的“领导”而非指令的模式。在私人的自由权利方面，也许将会长期相对低于西方，尤其是英美式自由主义国家，但是在社会公平方面，中国应该能做到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更公允、平衡的分配。应该也会更高度平衡国家集中统治与社会积极参与的民主。也就是说，创建一个真正值得被称作“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中国式民主模式。

2023年1月6日，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央组织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机构共同发布通知，要求贯彻农村人民广泛参与乡村建设。“通知”主要内容可以见于以下几条文字。第一条强调：“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的决策部署，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完善农民参与机制，激发农民参与意愿，强化农民参与保障，广泛依靠农民、教育引导农民、组织带动农民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根据《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制定本指南。”第五条含有以下的文字：“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坚持和完善“四议两公开”制度，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和共青团、妇女组织等作用，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开展宣传发动，增强农民参与感、责任感、归属感。”第二十一条：对入户道路、入院管道、户厕改造、庭院绿化、农房修缮等权属边界清晰的户属设施项目，由农民自主开展建设，行业主管部门提供规划引导、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持。第三十一条：创新乡村建设政府投入机制，通过先建后补等方式，引导农民群众由“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由“要我建”向“我要建”转变。（国家乡村振兴局等，2023）

## 六、与皮凯蒂倡议的“参与式社会主义”的异同

最近十年来，皮凯蒂关于西方国家不平等的研究以及据之号召的“参与式社会主义”

“participatory socialism”改革方案，招引了全球许多人的关注，起到较大的影响。一本 700 多页长的重量级学术研究居然卖到 200 万册，并导致全球 100 多个小组的后续研究。将上述的中国实际与改革愿想与皮凯蒂提出的西方改革方案相比，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两者的意涵。它们既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也有一定的深层不同。这里仅做简单的总结性讨论。

一个重要的相通点在，皮凯蒂提出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是从欧盟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德国和瑞典的企业主（资本家）和企业职工共同决策制度“co-determination”出发的提议。<sup>4</sup>（Piketty, 2021; Piketty 2022; 黄宗智 2022b）它目前在中国尚未被实施。但应该是一个适用于中国的愿想。其关键在建立具有实质性权力的代表企业职工的工会，做到真正由职工们与资本家分享企业决策的实际权力。

2018 年，中国已经提出要追求让现有社会“群团”——不仅包括工会，还包括妇联、青年团等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群团组织——在未来起到比较更实际和强大的作用，通过他们的参与而推动向“社会主义”理想愿景发展的想法。<sup>5</sup> 迈出那样的一步，中国将会更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更稳定地平衡集中与民主积极参与的国家。

正如皮凯蒂指出，我们不用怀疑，在西方的企业中，长期为一个企业投入劳动的职工们，其对企业的认识和企业命运的认同，并不必定会逊于企业的资本掌控者，相比那些仅仅为了谋求某企业

---

<sup>4</sup> 德国限于千人以上的企业。

<sup>5</sup> 2018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第七部分含有以下的文字：“要聚焦突出问题，改革机关设置、优化管理模式、创新运行机制，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将力量配备、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更好适应基层和群众需要。促进党政机构同群团组织功能有机衔接，支持和鼓励群团组织承接适合由群团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增强群团组织团结教育、维护权益、服务群众功能，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的股票增值而购买公司股份的投资者来说尤其如此。德国和瑞典的成功经济实例已经说明，其参与式（部分）社会主义企业的绩效和生命力并不逊于完全资本主义型的企业。这无疑是一个对中国企业带有一定启示的模式，值得中国认真考虑(Piketty 2020)。

皮凯蒂所提出的西方改革方案的核心设想是，围绕累进税收，特别是针对最富裕的 1% 人士的“财富” wealth 遗产税的改革。他指出，一位突出的企业家三四十岁创业之后，一般能够掌控该企业四五十年。但实际上，时间长了，已经不一定还会做出最好的决策，而且，也已经获得足够的回报。皮凯蒂指出，二战后和 1980 年代之前，美国的财富税率对巨富人士曾经高达 70%。他倡议社会应该借助那样的财富的一定比例来建立每个公民到 25 岁便可获得一笔（今天的购买力的）20 万美元供其用于专业技能进修、选择工作的依据（使其不必像目前这样为了紧迫的生存压力而接纳最低等的工作），乃至购买住房。(Piketty, 2022)但中国的改革经济体是一个刚开始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体系的国家，尚未建立遗产继承税的体系，短期内不可能做到皮凯蒂那样的设想。中国目前正在做的方案是较大规模的“扶贫”和逐步扩大由政府提供的正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范围。通过对最富裕 1% 人士们的（收入的）累进税以及（其财富的）遗产税来为社会公平措施融资，无疑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进路。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用来估算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上，目前德国(31.9)和瑞典(30.0)相对比较均衡,美国(41.4)和中国(38.5——2018 年)<sup>6</sup>则都相对较高。在这个方面，显然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World Bank 2022a)若以“财富”而不是年收入来估算，最高的 1%和其余的人相差无疑还要高一——虽然，这方面的数据目前仍然相对模糊，不够精准。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明文将建立社会主义和追求“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设定为最高目标。相比西方，未来中国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应该只会过之而无不及。

---

<sup>6</sup> 之前，世界银行曾经对中国做过基尼系数从 1990 年的 33.2 低点，攀升到 2010 年的 43.7 最高点，而后下降到 2019 年 38.2。见 World Bank, 2022b。

虽然，其具体方案无疑将与皮凯蒂从西方历史现实出发的改革倡议和愿想会有一些的不同。尤其在乡村一级，中国社区人际关系的紧密性或潜在紧密性仍然远超过一般西方国家的乡村，给予人民“参与”村庄发展和治理不同于西方的潜能。

改革以来中国国家已经制定了结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以及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两者并存的大框架。这里指向的，让企业建立资本家和工会共同决策的体系，继续推进平衡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均，以及稳步迈向中国式的动员“最大多数人民”为了其自身的“根本利益”而建树“参与式社会主义”来平衡集中与民主二维，应该可以说是再合理不过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参考文献：

Gustafsson, Bjorn, Xiuna Yang, and Terry Sicular, 2020, “Catching Up with the West: Chinese Pathways 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The China Journal*, no. 84, July : 102-127.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iketty, Thomas, March 14, 2020, “Thomas Piketty Explains Why the World is Ripe for ‘Participatory Socialism’”, *Fast Company*,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476804/thomas-piketty-explains-why-the-world-is-ripe-for-participatory-socialism>

Piketty, Thomas, 2021. *Time for Socialism: Dispatches from a World on Fire, 2016-2021*.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iketty, Thomas, Transcript: Ezra Klein Interviews Thomas Pikett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6/07/opinion/ezra-klein-podcast-thomas-piketty.html>

Sicular, Terry, Xiuna Yang, and Bjorn Gustafsson, 2021, “The Rise of China’s Global Middle Clas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ZA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 July 2021 , <https://docs.iza.org/dp14531.pdf>, published in *China & World Economy*, 30 (1), 5 – 27.

World Bank, 2022a, “Gini-coefficient by country,”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gini-coefficient-by-country>. Accessed Sept. 24, 2022.

World Bank, 2022b, “Gini Index – Chin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locations=CN>. Accessed Sept. 24, 2022.

《19个大的解放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121/07/2672576\\_596265989.s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121/07/2672576_596265989.shtml)）。

《202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外出农民工规模及农民工平均年龄分析[图]》，2022.6.21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AD870BR055360T7.html>

高原，2018，《现代中国的乡村发展：微观案例和宏观变迁》。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桂华，2022，《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2期：107-115页。

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央组织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农业农村部  
关于印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2023年1月6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1/17/content\\_5737525.htm](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1/17/content_5737525.htm)

黄宗智，2022a，《从简约治理的第三领域到党民结合的第三领域》，载 *Rural China*, v. 19, no. 1:1-30。

黄宗智，2022b，《从二元对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载《开放时代》，第4期：141-161。

黄宗智，2021a，《农业内卷和官僚内卷：类型、概念、经验概括与运作机制》，载 *Rural China*, v. 18, no. 2:169-191。

黄宗智，2021b，《从土地的资本化到资本的社会化：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政治经济学》，载《东南学术》，第3期：第79-95页。

黄宗智，2020a，《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 2020b, 《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 实践与理论》,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 2019, 《专著传统与中国学术: 从首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谈起》, 载《开放时代》, 第3期: 第215-223页。

黄宗智, 2016,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 载《开放时代》, 第2期: 第11-35页。

黄宗智, 2010,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北京: 法律出版社。

“ 脱 贫 攻 坚 战 , ” 2022, 百 度 百 科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B1%E8%B4%AB%E6%94%BB%E5%9D%9A%E6%88%98/18891455?fr=aladdin>。2022年9月24日查阅。

徐俊忠, 2022, 《何谓“人民”——历史的视角》, 载《经济导刊》, 7月期。

中共中央印发, 2018,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3/21/content\\_5276191.htm#1](http://www.gov.cn/zhengce/2018-03/21/content_5276191.htm#1)。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0.12.18 《警惕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 [https://www.sohu.com/a/438579614\\_260616](https://www.sohu.com/a/438579614_260616)。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https://zh.m.wikipedia.org/zh/%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9%AB%98%E7%AD%89%E6%95%99%E8%82%B2>。

周黎安, 2019, 《如何认识中国? ——对话黄宗智先生》, 载《开放时代》, 第3期: 37-63页。



